



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 ——法國篇

Dunhuang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 France

鄭阿財 (Cheng A-tsai)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壹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敦煌學是一門以中國地名——敦煌——命名的學科，更是一門國際化的學科，除了中國之外，在世界各國許多地方都設有專門的機構長期而持續的進行敦煌學研究，通過這種跨越國際藩籬的通力合作，敦煌學有了多面向的發展，藏經洞的發現至今不過百年，相關研究成果則已是蔚為大觀。根據拙編《1908-1997 年敦煌學論著目錄》所收錄的中、日文篇章，即已多達一萬二千筆。

這種跨國際研究的形成有其內外緣因素，一者由於敦煌地處中西交通孔道，四大文明在此交會，文獻本身呈現多元文化的殊異性，當然是其普受各國學者重視的主因；再者，敦煌文物在發現之初，便由於英、法、俄、日……等國的車運輦載而散落世界各地，各國對敦煌文物的收藏、整理與研究，自然也是造成敦煌學國際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這些國家在取得文物後，各自進行研究，因為所獲不同，著眼點不同，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對於敦煌學的形成與發展自然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其中法國的敦煌學可說發軔既早，成果亦豐。眾所週知的，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在 1908 年從王道士手中取走的敦煌文獻是既多且精。這也是為什麼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東方寫本部一直是敦煌學者絡繹不絕穿梭其間的主因。

又敦煌藏經洞雖然是早在 1900 年發現，但敦煌文獻真正被學術界所知道，主要則是從伯希和將他在 1909 年所得到的敦煌四部要籍精品帶到北京並展示給中國學者後才開始的。此後，由於羅振玉、蔣斧、王仁俊、劉師培……等的重視，相繼從伯希和處抄錄敦煌文獻撰寫跋語、笱記加以刊布，或為文宣說，大加倡導，促使敦煌文獻的價值大顯於世。從此之後，敦煌學的研究便在中國、日本及歐洲等地，不斷的發展，而成為一門國際顯學。

法國除了藏有既多且精的敦煌文書與藝術品外，再加上伯希和、戴密微等敦煌學大家及「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敦煌寫本研究組」等機構長期有計畫的整理和研究，因此成果斐然，堪為歐洲敦煌學研究的龍頭。

● 貳

伯希和到達敦煌莫高窟是在 1908 年 2 月 25 日，他的考察隊帶著豐富的敦煌文物離開莫高窟是在 1908 年 5



月 30 日。但從廣義的敦煌學來看，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展開，則早在 1899 年便開始。邦寧（Charles Eudes Bonin 1865-1929）在 1899 年至 1900 年間造訪中國西北。他由上海出發，取道甘肅、青海、新疆，前往俄屬突厥斯坦，9 月途經敦煌參觀千佛洞時，拓製了莫高窟千佛洞所存碑文。然後入阿爾金山脈，到羅布泊，在塔裡木河下游與斯文赫定會面，北上焉耆、迪化（今烏魯木齊），西向俄屬中亞地區。1901 年在法國地理學會出版的「地理雜誌」（*La Géographi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發表了〈從北京到俄屬突厥斯坦行記〉（*Voyage de Pékin au Turkestan russe*）、在法國金石文學院會議錄（*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發表了〈介紹千佛洞〉（*Les grottes des Mille Bouddhas*）。這兩篇文章中，對敦煌與莫高窟有簡單記錄，可謂是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先聲。而邦寧所攜回的敦煌碑文拓本引起了當時法國漢學界大師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高度的關切。後來交由沙畹研究，1902 年發表在《中亞的十種漢文碑銘》（*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estampages de M. Bonin*）一書中。其中包含了與敦煌有關的六方，即：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姜行本紀功碑、唐李府君修功德碑、唐李氏再修功德碑、莫高窟六體石刻、重修皇慶寺碑記。1913 年，沙畹又出版了《斯坦因在西域所獲漢文文獻》一書。書中考釋斯坦因兩度至西域探險所取走的漢晉木簡與唐代文書，其中也包含了敦煌文物。

沙畹自 1893 年起，即主持法蘭西學院的「漢族和韃靼——滿族語言與文學講座」，此一講座，設立於 1814 年，是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法國的漢學研究中心，沙畹當時執法國漢學界之牛耳，作育英才無數，伯希和（Paul Pelliot）、馬伯樂（Henri Maspéro 1883-1954）、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這些法國敦煌學界的重要學者，都是他的學生，影響力不可謂不大。對敦煌學而言，伯希和更是重要的人物。

伯希和早年在法國政治科學院、東方語言學院等處學習。1899 年起，供職於設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並曾數度奉命前往中國，為該學院購買中國古籍。伯希和是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除了精通漢語之外，還懂得幾種中亞流行的語言。由於他在語言上的天賦和對中國圖書版本學的知識，為他後來在選取藏經洞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1905 年「中亞與遠東歷史、

考古、語言及人種學考察國際協會」組織中亞考察隊時，伯希和便以其豐富的中國經驗和漢學素養被法國分會會長塞納（Emile Senart）任命為隊長，與測量師瓦揚（Louis Vaillant）和攝影師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於 1906 年至 1908 年間進入新疆絲綢之路北道，發掘巴楚、庫車等地的佛教遺址。

1907 年 10 月到達烏魯木齊。伯希和從清朝伊犁將軍長庚處，得知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古代寫本的消息，便取消原訂計畫，立即趕赴敦煌。深入莫高窟，對全部洞窟編號，並抄錄題記、攝制大量壁畫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漢語，並熟悉中國古典文獻，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後，將藏經洞中的遺物全部檢閱一遍，選取佛教大藏經未收的文獻、有題記的文獻及非漢文的文獻等大量精品，還有大批的繪畫、絲織品。這些文物被運到巴黎後，寫本部分歸藏於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絹畫、絲織品等入藏吉美博物館。這批珍貴敦煌文物成為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基底。

在法國敦煌學研究中，首先登場的是伯希和一系列的考察報告，這批考察報告包括了：1908 年，伯希和在敦煌時，將重要的發現用書信的形式報告給塞納，後編為〈甘肅發現中世紀的藏經洞〉（*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一文，發表在《法國遠東學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第 8 卷 3、4 期，（1908），陸翔曾漢譯，題為〈敦煌石室訪書記〉（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9 卷 5 期，1935）。另外還有〈1908 中亞考察報告——伯希和 1908 年 2 月 3 日給地理學會的信件〉（*Notre mission en Asie Centrale, lettre adressée à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le 3 février 1908*）（1908）、〈伯希和的中亞考察〉（*La mission Paul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1909）、〈在高地亞洲度過的三年〉（*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1910）、〈伯希和中國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報告〉（*Rapport de M. Paul Pelliot sur sa mission en Turkestan Chinois (1906-1909)*）（1910）、〈伊朗文化對中亞和遠東的影響〉（*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1911）、〈千佛洞〉（*Les grottes des Mille Bouddhas*）（1914）、〈敦煌石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1920-1924）、〈伯希和考察：東亞和西藏〉（*La Mission Pelliot : Asie Centrale et Tibet*）（1921）等。這些考察報告雖然學術上的價值不高，但是在當時發揮了向西方學者引介敦煌新發現的作用。

此外，還大量的刊布文獻與圖錄，如將所拍攝的敦



煌壁畫照片，編為《敦煌石窟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全六冊 (1920-1924)；與高梯奧 (Robert Gauthiot) 合作，將粟特文《佛說善惡因果經》刊布 (1920-1928)；與日本的羽田亨合作，刊布漢文《敦煌遺書》(1926)。這些文獻、圖錄的披露，提供當時學術界極為難得的資料，促進敦煌學的研究。伯希和去世後，法國學者曾編輯《國立圖書館藏伯希和探險隊所獲文獻資料叢刊》(Mission Paul Pelliot, document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和《伯希和探險隊考古資料叢刊》，整理伯希和帶回的敦煌和中亞資料，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s de notes,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

法國的敦煌學研究，在二次大戰前，可以說是由伯希和獨領風騷的局面。其間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十之八九都是出於伯希和。這樣的情形，恐怕和當時敦煌資料未經整理，流傳不廣有關。

二次大戰後，法國敦煌學開始大放異彩，其中諸如戴密微對佛學、俗文學的研究，謝和耐對佛教語錄的研究，戴密微所帶領的對單一寫本進行考釋的風氣等，成就都十分可觀。有鑑於法國漢學在敦煌學部分的斐然成就，1973 年，在戴密微、謝和耐、蘇遠鳴的倡導下，法國成立了專責的敦煌學研究組織，即法國國立科研中心根據與法國高等實驗研究學院第四系之間的協議，成立「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第 438 聯合研究組」，又稱「法國敦煌寫本研究組」，今更名為：「法國科學研究中心中國寫本、碑銘和圖像文獻研究組」，簡稱「URA 1063 研究組」。戴密微、梅弘理、戴仁等，先後擔任該中心主任。另一方面由於伯希和所攜回的敦煌寫卷內容十分豐富而龐雜，包含了宗教、政治、社會、法律、歷史、地理文學、語言、音樂、舞蹈、美術、天文、曆數、醫藥等層面。有鑑於此，「法國敦煌寫本研究組」特別網羅各研究領域的菁英，所以小組成員包括了：蘇遠鳴、謝和耐、艾麗白、隋麗玫、華梅雪、傑尼、康德謨、戴仁、童丕、侯錦郎、吳其昱、左景權、陳祚龍、郭麗英、王牡丹、馬若安、科恩等。

● 參

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通力合作，進行研究，既能符合敦煌文獻的特性，同時也更使得法國敦煌學研究的

面向趨於多樣，由於伯希和從敦煌所獲得的大批珍貴文物，概括而論，可區分為寫本文書與繪畫文物二大類；其中寫本文書依其文字又可區分為漢文文書與非漢文文書二大類。這些文書與文物的特色也造就了法國敦煌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與成果的面向。以下試就漢文文獻、非漢文文獻及繪畫文物等三方面，略述法國敦煌學的研究概況。

一、漢文文獻研究

首先是有關敦煌文書目錄的編纂工作，從伯希和回法國後，為了促進敦煌學研究的開展，目錄的編纂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事實上，伯希和在返回法國後，即已開始著手進行敦煌文獻的編目工作，1920 年，曾編製所獲部分敦煌漢文寫本的目錄 (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羅福苒譯，載《國學季刊》第 1 卷 4 期、第 3 卷 4 期；陸翔譯，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7 卷 6 期、第 8 卷 1 期，目錄初稿計收錄了 1532 個寫卷，雖然有許多令人不盡滿意的地方，但在當時實在是彌足珍貴的重要參考資料。

1934 年，王重民編《伯希和劫經錄》，對目錄作了補充。1952 年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的謝和耐和吳其昱在既有目錄的基礎上，開始對法藏敦煌文獻展開全面新的目錄的編纂工作。這項工作在 1955 年完成，但遲至 1970 年才出版，稱作《法國國立圖書館藏伯希和漢文寫本目錄 (一)》(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I)。第二卷由左景權和法國國立圖書館方面負責，然而至今未有下文。由於目錄編纂工作的遲滯對敦煌學的研究影響甚鉅，法國敦煌學界亦極思改善此一情形，於是在 1973 年，在戴密微等人的倡導下，法國科學研究中心成立了敦煌寫本研究組，其任務之一，即是加速完成法藏敦煌目錄的編纂工作。在此一專責機構的運作下，第三卷至第五卷目錄終於分別順利出版。第一卷計著錄伯希和所獲的敦煌漢文卷子編號 2001-2500 (1970 出版)；第三卷著錄編號 3001-3500 (1983 出版)；第四卷著錄 3501-4000 (1991 出版)；第五卷著錄 4001-6040 (1995 出版)。目錄係就每一編號的寫卷各出一條注記。著錄寫卷的內容，包含：原卷標題、正面背面抄寫內容、拼接綴合與抄本異同等情況；根據原卷描述寫卷的自然形態，包含：紙質、尺寸、紙幅、書法、墨色、葉數、行數、每行字數……等



情況；每條注記指出該寫卷的影印與錄文的刊布情況，並列舉代表性的相關研究論著篇目，以供參考。各卷後均附有題記、年款、印章、畫押、武后新字等文書的索引，極便檢索。

法國在敦煌漢文文獻的研究成果，與法國所藏敦煌漢文文獻的內容特性與及法國學術傳統與風氣息息相關。因而在宗教、社會、經濟及書籍學等方面，表現最為突出，且深具特色。

在宗教研究方面，由於敦煌文書宗教文書幾乎佔了百分之九十，其中佛教文書又是絕對多數。因此，有關佛教的研究，最受關注。二次大戰後，法國敦煌學界一反戰前的沈寂，開始有著輝煌的發展。其中佛教的研究是最大的研究領域。主導此一研究領域的靈魂人物，是戴密微。戴密微的佛教研究，以《拉薩宗教會議》(Le concile de Lhassa) (1952) 一書最具影響力。此書副題作「八世紀梵漢佛教徒之間關於寂靜主義的論爭」(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é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1970 年改名為「吐蕃僧諍記」。此書不論在敦煌學、佛教學，敦煌漢文文獻或藏文文獻的研究上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材料引用的廣泛，問題探討的深入，對敦煌學研究產生極大的示範作用。內容主要針對編號 P.4646 王錫《大乘頓悟正理決》進行翻譯，詳加注釋，並廣泛利用敦煌漢藏資料考證有關西元 792 至 794 年拉薩宗教爭論的歷史背景，特別是漢地禪僧摩訶衍與印度僧人蓮花戒有關頓漸問題的爭論，此書一出，引起歐美及日本學者的熱烈討論。其他如：〈惠能及其壇經〉(Le Sutra de l'Estrade de Houei-neng) (1944-1949)，〈有關中國禪宗的兩卷敦煌文書〉收入《紀念塚本善隆教授佛學論文集》(“Deux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sur le Dhyana chinois”，in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presented to Professor Zenryu Tsukamoto*) (1961)，也是利用 P.4646 及 S.2672 二件敦煌漢文寫卷討論吐蕃僧諍問題、〈從敦煌文獻看漢傳佛教之傳入西藏〉(L'introduction au Tibet du Bouddhisme sinisé d'aprè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Analyse de récents travaux japonais)) (1979) 等篇。在歐美敦煌學佛教研究上，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1949 年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的佛教語錄研究也是敦煌佛學研究另一重要的發展。相關論文包括了：〈荷澤神會禪師語錄〉(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ana Chen-houei du Ho-tso (668-760) (1949)、〈瀉山靈祐大師語錄〉(Les

entretiens du Maître Ling-yeou du Kouei-chan (771-853) (1951)、〈荷澤神會禪師語錄補考〉(Complément aux Entretiens du Maître du Dhyana Chen-houei (668-760)) (1954) 三篇，可說是首開佛教語錄研究風氣之先。

此外，蘇遠鳴 (Michei Soymie) 〈地藏菩薩的十齋日〉(Les dix jours de jeune de Ksitigarbha) (1979)；梅弘理 (Paul Magnin) 〈佛法東流傳的古本〉(L'ancienne version du Fo-fa tong-lieou-tchouan) (1981)、〈問答式佛教教育的一個實例〉(Un exemple de catéchèse bouddhique) (1984)、〈祭拜佛陀的供養人和藝人〉(Donateurs et joueurs en l'honneur du Buddha) (1996)；魏普賢 (Hélène Vetch) 〈劉薩訶與敦煌莫高窟〉(Lieou Sa-ho et les grottes de Mo-kao) (1981)、〈劉薩訶：傳統與圖像〉(Liu Sahe, traditions et iconographie) (1984)；左景權 〈P.2965 佛說生經殘片介紹〉(Un fragment du Fo-chouo-cheng-king. Le manuscrit P.2965) (1981)；傅博納 (François Fourcade) 〈菩提達摩論今譯〉(Le traité de Bodhidharma (trad.)) (法文) (1986)；戴路德 (Hubert Durt) 〈佛母經與摩訶摩耶經中佛涅槃後向其母現形考〉(L'apparition du Buddha à sa mère après son nirvâna dans le Sutra de Mahamaya et le Sutra de la Mère du Buddha) (1996)；吉埃斯 (Jacques Gies) 〈敦煌唐王朝佛教舉隅〉(Un témoignage du bouddhisme impérial Tang à Dunhuang) (1994)；王微 (François Wang Toutain) 〈禁食酒肉——中國佛教的特點〉(Pas d'alcool, pas de viande : une particularité du bouddhisme chinois) (2000) ……等，都是敦煌佛教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魏普賢〈劉薩訶與敦煌莫高窟〉、〈劉薩訶：傳統與圖像〉兩篇論文對所有有關劉薩訶故事的文獻和圖像作了詳盡的考釋，大致訂定出一個劉薩訶年譜，並以時、地為線索追蹤劉薩訶故事情節演變的情形。

關於發願文的：梅弘理〈伯希和 3183 號天台宗智者大師發願文——受淨土思想影響的一件抄本〉(Une copie amidiqque du T'ien-t'ai Tch'e-tcho ta-che fa-yuan wen, étude sur le manuscrit P.3183) (1979)、郭麗英〈P.2189 東都發願文小考〉(Un texte ancien de vœux et de confession, P.2189, le “Vœu de la capitale de l'Est”) (1984)，透過對東都發願文題跋及內容的整理，探討梁武帝當時舉行宗教活動的情形。侯錦郎〈敦煌寫本中的印沙佛儀式研究〉(La cérémonie du Yin-sa-fo d'aprè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1984)，此文公布及譯注了三種未刊的印沙佛文，侯錦郎並透過這些印沙佛文討論印沙佛在中世紀敦煌宗教生活中的重要



地位。又郭麗英〈五到十世紀中國佛教中的懺悔與懺儀〉(Confession et contrition 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du V^e au X^e siècle) (1994) 為作者博士論文的增訂本，主要利用佛教文獻與敦煌寫卷資料，論述佛名懺、藥師懺等中國佛教的各種懺悔儀式，並針對敦煌佛教教團有關的懺悔儀式進行深入探討。另外還有王微〈春祭——二月八日節的佛教儀式〉(Le sacre du printemps: les cérémonies bouddhiques du 8^e jour du 2^e mois) (1996)，則是利用佛教文書進行佛教活動與文化研究的篇章。

在道教方面，由於道教研究是西方漢學界極為重視的研究課題，法國學者更是此一領域的先行者。因此有關敦煌道教文獻的研究，自然成為法國敦煌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其研究成果主要有：吳其昱《敦煌發現七世紀道教佚經〈本際經〉寫本》(Pen Tsi King (Livre du Terme Originel) Ouvrage taoïste inédit du 7^e siècle. Manuscrits retrouvés à Touen-houang) (1960)，此書為「伯希和探險隊所獲文獻資料叢刊」第一卷。內容除對道經基本情況及太玄真一《本際經》的詳細情形加以介紹外，並影印刊載美、法所藏 63 件《本際經》的相關寫本圖版，是敦煌道經分類整理研究的開端。康德謨 (Max Kaltenmark) 〈本際經人物考〉(Notes sur le Pen-tsi King, Personnages figurant dans le sutra) (1979)、勞格文 (John Lagerwey) 〈無上秘要——六世紀的一本道教書〉(Wu-shang-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 (1981) 主要利用敦煌寫本及道藏中的《無上秘要》進行整理，加以注釋、翻譯，並概述六世紀道教的概況，析論敦煌本《無上秘要》成書背景、結構以及所反映的思想、教義與制度等問題。索安 (Anna Seidel) 〈斯坦因 2081 號太上靈寶老子化胡經研討〉(Le Sutra merveilleux de Lingpao suprême traitant de lao tseu qui convertit les barbares (le manuscrit S.2081)) (1984)、左景權〈洞淵神咒經組成考〉(La composition du dongyuan shenzhou jing) (1984)、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敦煌寫本所見道教仙品〉(Taoist ordination ranks in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1985)、穆瑞明 (Christine Mollier) 〈洞淵神咒經——五世紀的道教末日說作品〉(Une apocalypse taoïste du V^e siècle: le livre des incantations divines des grottes abyssales) (1990) 與〈道教與佛教的廚經〉(Les cuisines de Laozi et du Buddha) (2000) 等。敦煌文獻中，難能可貴的保有許多道藏未見的資料，在整理這些道教文獻方面，日本大淵忍爾的《敦煌道經目錄》是最受人矚目的成果，法國敦煌學者則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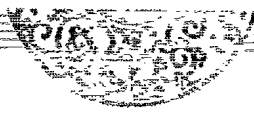
單一經典的考釋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包括了吳其昱、康德謨對《本際經》的研究、勞格文對《無上秘要》的研究、索安對《太上靈寶老子化胡經》的研究、左景權、穆瑞明對《洞淵神咒經》的研究。

在摩尼教方面，有：沙畹、伯希和〈中國發現的摩尼教經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traduit et annoté) (1911-1913)，主要考釋北京圖書館收藏編號字字 56 號敦煌漢文寫本《摩尼教殘經》，並考證摩尼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為漢文摩尼教經典及在華傳播史研究奠定基礎。

在景教方面，有：吳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贊研究〉(A Study of Ching-chiao san-wei meng-tu san) (1984)。

中國古代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從馬伯樂、謝和耐開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發展成為法國傑出的學術傳統，特別是敦煌漢文文獻提供了相當豐富且嶄新的研究素材，成就了法國敦煌學的另一特色。其主要研究成果有：謝和耐的博士論文《中國五至十世紀的寺院經濟》(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 (1956)。此書根據敦煌及其他西域文書，結合漢籍、佛典，以社會學的觀點分析中國南北朝到五代時期的寺院經濟。書中針對浮圖戶、寺戶、僧祇戶、常住百姓、碓戶、梁戶、長生庫、社邑、齋供、三階教無盡藏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在〈從九到十世紀的敦煌契約看中國的商品交易〉(La vente en Chine d'après les contrats de Touen-houang, IX^e-X^e siècles) (1957) 一文，透過對敦煌契約的整理，討論中國的專賣制度及中國契約文件在內容、簽字程序、責任歸屬等方面的特色，西方法學觀點的介入，是其新穎之處，而三個未刊寫本的公布，也具有價值。在〈敦煌租駝契研究〉(Location de chameaux pour des voyages à Touen-houang) (1966) 一篇中，謝和耐則研究了一批旅客為長途旅行租賃駱駝所簽下的契約，契約的內容主要在於保障飼主的權益，避免駱駝在旅行途中走失、受傷或死亡帶來的損失。透過這些租契的紀錄，可知駱駝是敦煌地區重要的交通工具，旅客租這些駱駝主要都是前往長安，並且為了相互照應，往往都是集體行動，這些資料，具有考察九世紀中亞運輸史的價值。〈敦煌請緩交地稅狀〉(Une demande de report d'impôt à Touen-houang) (1979) 是利用敦煌社會文書研究有關社會經濟等問題。

此外，吳其昱〈敦煌寫本所見七至十世紀的奴婢狀



況)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concernant l'esclavage sous les T'ang et au X^e siècle) (1979) 也是利用敦煌文書對社會問題的考察，是具有創意的論文。近年童丕 (Eric Trombert) 的研究，主要根據籍帳來進行，並利用契約、帳簿，成果亦頗為可觀，如〈十世紀的敦煌借貸人〉 (Prêteurs et emprunteurs de Dunhuang au X^e siècle) (1994)、〈十世紀的借貸契——中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與社會〉 (Le crédit à Dunhuang :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 (1995)、〈絲綢之路——六至十世紀的棉布由西到東向中亞地區的傳播〉 (Une trajectoire d'Ouest en Es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 La diffusion du coton dans l'Asie Centrale sinisée) (1996)、〈從寺院帳簿看敦煌二月八日節〉 (La fête du 8^e jour du 2^e mois à Dunhuang d'après les comptes de monastères) (1996)、〈啤酒與佛教：七至十世紀的敦煌寺院用酒例〉 (Bière et bouddhisme : la consommation de boissons alcoolisées dans les monastères de Dunhuang aux VII^e-X^e siècles) (2000) 等。可說繼謝和耐之後，利用敦煌文書研究社會經濟成果最為豐碩的一位後起之秀。

另外，侯錦郎〈伯希和 3432 號敦煌龍興寺寶物曆〉 (Trésors du monastère Long-Hing à Touen-houang. Une étude sur le manuscrit P.3432) (1981)，指出敦煌龍興寺器物曆是由趙石老卿所編，並寫於 P.3432 號寫卷背後的一本法器目錄。其中詳細描寫了龍興寺所藏法器的名稱、顏色、形製等。認為它基本反映了敦煌十七窟藏經洞十一世紀初封閉前收藏物的內容。

在民俗方面，則有：戴密微〈從一種唐代變文看胡人的習俗〉 (Quelques traits de mœurs barbares dans une chantefable chinoise des T'ang) (1962)、陳祚龍〈九世紀下半葉敦煌婚禮及習俗小考〉 (Note on the wedding ceremonies and customs observed in Tunhua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1972)、艾麗白 (Danielle Eliasberg) 〈關於敦煌灘的幾個問題〉 (Quelques aspects de l'exorcisme *no* à Touen-houang) (1984)、〈關於敦煌大灘的幾個問題〉 (Quelques aspects du grand exorcisme *no* à Touen-houang) (1984) 等。艾麗白譯注並且探討了灘儀式存在的作用及其民俗意涵。除了灘，艾麗白還進行了關於「兒郎偉」此一特殊體裁的研究，在〈幾個敦煌寫本中之兒郎偉的含義〉 (L'expression *eul-lang-wei* dans certain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1981) 一文中，整理出兒郎偉基本的形式和結構，探討其性質、產生背景及發展情形。

在書籍學研究方面，80 年代，戴密微的弟子根據寫本、帛書、簡牘、石刻等第一手資料，進行書籍學的研究成為一嶄新的課題。其中，以戴仁的研究最為可觀。戴仁是現任法國敦煌研究組的主任，他自 1977 年發表書籍學的重要論文〈敦煌寫本中的冊子本研究〉 (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後，即持續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並以穩定而多產的論文質量，建立在敦煌書籍學領域中的地位。其重要論文包括了：〈敦煌寫本中的冊子本研究〉 (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1977)、〈敦煌紀年寫本紙張研究〉 (Papiers de Dunhuang. Essai d'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és) (1981)、〈敦煌蝴蝶裝寫本研究〉 (Les accordéons de Dunhuang) (1984)、〈關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書志學小考〉 (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1985)、〈敦煌寫本紙張的纖維及其年代〉 (L'analyse fibreuse des papiers et la datation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1986)、〈寫本書與早期木刻本研究〉 (Le livre manuscrit et les débuts de la xylographie) (1986)、〈敦煌寫本紙張顏色小考〉 (Note sur les couleurs des papiers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1987)、〈敦煌與中亞寫本暨書籍史研究〉 (The Dunhuang and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and the history of books) (1988)、〈中國寫本文獻向印刷書籍的轉變〉 (Du rouleau manuscrit au livre imprimé en Chine) (1989)、〈寫本時代 (十世紀以前) 的中國藏書〉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1991)、〈書籍的蝴蝶裝與旋風裝〉 (Papillons et tourbillons) (1996)、〈敦煌文獻贗品散論〉 (Random Notes on Dunhuang Forgeries) (2000)、〈大隋求陀羅尼的早期印本〉 (Les premières impressions des *dh rran de Mah pratis ra*) (2000) 等。〈敦煌寫本中的冊子本研究〉一文中，統計出敦煌寫卷中的冊子本共有四百多種，年代大約集中在十世紀，最早為西元 899 年，最晚為西元 982 年。〈敦煌紀年寫本紙張研究〉提出根據語言、文體和紙張判斷寫卷年代並不可靠的說法，因為敦煌寫卷中有許多草稿、習作是抄自舊寫本內容，或利用舊寫本背面抄寫的。〈敦煌寫本紙張的纖維及其年代〉認為對敦煌寫卷進行型態學分析和微量化學分析，有助於更準確的辨別贗品。〈敦煌蝴蝶裝寫本研究〉則處理了敦煌蝴蝶裝寫本的名稱問題，並簡介敦煌蝴蝶裝寫本的斷代、內容、開本、類型、裝訂、版面編排等。〈敦煌寫本紙張顏色小考〉是有鑑於學者對於顏色的區分通常過度依賴感覺所



寫的一篇論文，爲了減少主觀上的差異，戴仁建議應該利用日本爲了分析土色而製作的《新版標準土色帖》作爲標準，建立敦煌寫本分類的統一性，以擺脫過去那套非系統化和往往很難傳播的名詞。《寫本時代（十世紀以前）的中國藏書》一書，作者充分利用歷代文獻與敦煌文獻，針對十世紀以前——宋代雕版印刷爲藏書主體以前——中國藏書的全面概況，包括了皇家藏書、分類方法、家藏書、佛教藏書、道教藏書等問題，特別對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重要佛教經錄論述綦詳，同時探討敦煌寫經的抄述、捐贈及寺院藏經構造等問題。

在寫本斷代的研究上，蘇遠鳴和梅弘理的成就也頗爲可觀，他們運用與戴仁不同的方法對寫本的年代進行鑑定。蘇遠鳴〈關於漢文寫本的斷代問題〉（*La datation des manuscrits chinois*）（1990）主張運用內部考證（包括：人名、地名、寺名、職官名、施政細節、社會制度內容等方面）加上外部考證（包括：卷面表面和古文字等部分）進行交相參證，以確立寫本的時代，走的是考據的路線。梅弘理〈宗教活動和紀年寫本〉（*Pratique religieuse et manuscrits datés*）（1987），以「僧眾們的活動和佛教徒們的信仰在任何時候都逃不脫歷史漩渦」的觀點，運用對應歷史事件的方法，追查寫本斷代的線索。梅弘理相信，當文書中的一系列缺乏年代或含有斷代寫本出現經常性的空缺時，那麼當時在敦煌地區或在中原地區都應當有相對應的具體事件發生。

另外，艾麗白和石內德對寫本標識符號的研究，也深具代表性。相關論文包括了：艾麗白〈敦煌漢文寫本中的鳥形押〉（*Les signatures en forme d'oiseau dans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1979）、石內德（Richard Schneider）〈敦煌寫經本中的廢棄標記〉（*Les copies de sutra défectueuse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1996）、艾麗白〈敦煌寫本中的塗鴉〉（*Les graffiti figuré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1999）。

敦煌文學的研究，主要以俗文學最受矚目。1952年，戴密微開始展現對俗文學的關懷，〈俗文學的起源〉（*Les débuts de la littérature en chinois vulgaire*）、〈唐代的佛教；敦煌俗文學的起源〉（*Le bouddhisme sous les T'ang: les débuts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en langue vulgaire*）兩篇文章是敦煌文學研究的先聲，其中也展現了日後結合佛教和俗文學的研究取向。此後陸續發表了〈武則天時代的佛教；敦煌俗文學作品〉（*Le bouddhisme sous l'Impératrice Wou :*

textes de littérature vulgaire de Touen-houang）（1953）、〈中國的佛教疑偽經；敦煌俗文學作品〉（*Apocryphes bouddhiques en Chine : textes de littérature vulgaire de Touen-houang*）（1954）走的都是這個路線。其後戴密微並將觸角伸向文學，由詩詞至俗曲。代表作品包括了：〈九世紀的禪宗；敦煌俗文學作品〉（*Le Tch'an au IX^e siècle : textes de littérature vulgaire de Touen-houang*）（1961）、〈禪宗與詩詞；敦煌俗文學作品〉（*Tch'an et poésie : textes de littérature vulgaire de Touen-houang*）（1962）等篇章。

其中通俗白話詩人王梵志及其作品的研究最爲熱門，主要有：吳其昱〈關於王梵志的敦煌寫本〉（*Un manuscrit de Touen-houang concernant Wang Fan-tche*）（1958）、〈禪宗；敦煌俗文學作品（王梵志 I）〉（*L'école du Tch'an : textes de littérature vulgaire de Touen-houang (Wang Fan-tche, I)*）（1957）、戴密微〈禪宗；敦煌俗文學作品（王梵志 II）〉（*Textes de littérature vulgaire de Touen-houang (Wang Fan-tche, II)*）（1958）、〈王梵志詩研究〉（*Etude de l'oeuvre poétique de Wang le Zélateur*）（1959）、尤其戴密微的遺作〈王梵志詩和太公家教研究〉（*L'oeuvre de Wang le Zélateur (Wang Fan-tche), suivie des Instructions de l'aïeul (T'ai-kong Kia-kiao). Poèmes populaires des T'ang*）（1982）。這是戴密微的遺稿，由他的弟子加以整理印行。書中導論部分，對王梵志及其作品作了全面性的探討，並將英、法、俄等國所藏 25 種王梵志詩寫本進行輯錄，譯爲法文。作者又以爲王梵志詩一卷本在內容思想上與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極爲相近，所以書中也將各個敦煌本《太公家教》進行校注與翻譯合編印行。魏普賢〈再談王梵志——兩份未出版的敦煌寫本（P.3724，S.6032）〉（*En marge de l'oeuvre de Wang le Zélateur : deux manuscrits inédits*）（1984）此文則是戴密微前著「王梵志詩」的補遺，補錄了 P.3724 及 S.6032 二件寫本。

此外，敦煌詩歌的研究，尚有：吳其昱〈尚未刊布過的三首賈休詩〉（*Trois poèmes inédits de Kouan-hiou*）（1959）。

在敦煌曲子詞研究方面，主要有：戴密微、饒宗頤《敦煌曲》（*Airs de Touen-houang, Touen-houang k'iu, Textes à chanter des VIII^e-X^e siècles*）（1971）戴密微與饒宗頤合作「伯希和探險隊所獲文獻資料叢刊」第二卷，全書分：中文、法譯及圖版三部分。內容計有：引論、本編、附錄三部分。引論主要討論敦煌曲的年代、作者、成立等問題。本編則討論新增曲子、佛曲歌詞及《雲謠集雜曲子》



等校錄以及聯章佛曲的篇目。附錄則有敦煌曲韻、詞調、號索引及圖版 116 幅，為敦煌曲全面的整理與研究。其他如蘇遠鳴〈敦煌的傳說與曲子詞〉(*Histoire et ballades de Touen-houang*) (1962)。

有關變文及靈驗故事的研究，主要有：蘇遠鳴〈孔子項托相問書研究〉(*L'entrevue de Confucius et de Hiang T'o*) (1954) 根據英、法所藏的十二個漢文寫本《孔子項託相問書》加以校錄，並譯介了三個藏文本。陳祚龍〈王敷所出茶酒論小考〉(*Note on Wang Fu's Cha Chiu lun (A Dialogue between Mr. Tea and Mr. Wine)*) (1961)、戴密微〈從黃仕強傳看唐代的入冥記〉(*Une descente aux enfers sous les T'ang, la biographie de Houang Che-Kiang*) (1976)；鄭慶歡〈從歷史到傳說——中國歷史上的女英雄王昭君〉(*Wang Zhaojun, une héroïne chinoise,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1986)。

其他文學方面，則有：梅弘理〈依中國中論三短文探討思想經驗論說〉(*Dépassement de l'expérience noétique selon trois courts traités de Madhyamika chinois*) (1984)、石內德〈印度僧人五臺山遊記〉(*Un moine indien au Wou-t'ai chan : relation d'un pèlerinage*) (1987)、艾麗白〈敦煌寫本之二上梁文〉(*Deux chansons pour hisser la poutre (Chang leang wen)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1994)、艾麗白〈貧僧吟〉(*La complainte des pauvres moines*) (1996) 等。

在傳統四部典籍研究方面，主要為吳其昱的論文篇章，如：〈列寧格勒藏一件西夏文論語集解〉(*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à Léningrad*) (1969)、〈敦煌文獻中新發現兩件唐代珠英集殘片〉(*Deux fragments du Tchou-ying tsi, une anthologie de poèmes des T'ang (ca 702) retrouvés à Touen-houang*) (1974)、〈珠英集中的十四位詩人〉(*Quatorze poètes du Tchou-ying tsi*) (1981)。其中〈敦煌文獻中新發現兩件唐代珠英集殘片〉說明了《珠英集》兩殘卷的收藏地、版本樣式、現存狀態，並進一步考證巴黎藏殘卷的斷代，以及詩集本身在古叢書目錄中的蹤跡及其編撰者、卷中部分詩人名字的考證。〈珠英集中的十四位詩人〉則介紹了《珠英集》中十四位珠英學士的傳記，這十四位詩人分別為：崔融、韋元旦、沈坐期、李適、崔湜、劉知幾、王無竟、馬吉甫、齊備、元希聲、房元陽、楊齊哲、胡皓、符鳳。

在語言文字方面，有：戴仁〈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武則天新字〉(*Les caractères de l'Impératrice Wu Zetian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1984)。在字書方

面，有：陳祚龍〈敦煌漢文字書殘片——千佛洞所出《字寶》研究〉(*Fragment d'un lexique chinois de Touen-houang: documents précieux de la "Grotte des immortels"*) (1964)。

音韻方面有：伯希和〈幾個藏名的中文音譯〉(*Quelqu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noms tibétains*) (1915)、〈千字文漢藏對音本〉(*Sur un manuscrit chinois du Ts'ien-Tseu-wen avec transcription tibétaine*) (1920)，王聯曾〈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唐代的音韻字典〉(*Un dictionnaire phonologique des T'ang: le Ts'ie yun corrigé et complété de Wang Jen-hiu*) (1957)、〈關於新發現的敦煌音韻資料的幾個問題〉(*Remarques sur un nouveau recueil de documents phonologiques de Touen-houang*) (1963)……等。

歷史文化方面，主要有：陳祚龍《唐五代敦煌名人逸真贊》(*Eloges de personnages éminents de Touen-houang sous les T'ang et les Cinq Dynasties*) (1970)，內容係輯錄法藏敦煌漢文寫本中有關的逸真贊 50 篇細為校錄，並論述逸真贊文體的來源等問題，提供吐蕃時期與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寶貴的人物傳記資料。〈悟真的生平和作品 (816-895)——對敦煌歷史文化的一點小考〉(*La vie et les oeuvres de Wou-tchen (816-895):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Touen-houang*) (1966)，內容主要針對敦煌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最重要的僧人悟真進行研究，蒐羅敦煌文獻中有關悟真的詩歌、逸真贊等相關文獻，進行校錄，譯成法文，並論述悟真的生平事蹟及其地位。

占卜研究在法國自 60 年代起形成一股熱潮，對於中國占卜的研究不論是占卜與社會、占卜與宗教，或占卜術的探討，均受到相當的注意。敦煌文獻所保存的各種占卜資料也成了法國敦煌學界鮮明的研究課題。其主要成果有：侯錦郎〈伯希和 3390 號唐代相面術研究〉(*Physiognomonie d'après le teint 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 une étude sur le manuscrit P.3390*) (1979)、戴仁〈敦煌寫本解夢書研究〉(*Clefs des songes de Touen-houang*) (1981)，尤其以茅干 (Carde Morgan) 的系列研究，最具成果。如〈敦煌寫本中的九宮圖〉(*Les "neuf palai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1981)、〈敦煌寫本中的狗占〉(*Dog divination from Dunhuang manuscript*) (1983)、〈敦煌寫本中的五姓〉(*L'Ecole des Cinq Nom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1984)、〈敦煌寫本中的烏鴉占〉(*La divination d'après les croassements des corbeaux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1987)、〈唐代風水——五姓理論及其平遺〉(*T'ang geomancy:*



the Wu-hsing (Five Names) theory and its legacy) (1990-1991) ……等。其中茅干的〈敦煌寫本中的五姓〉運用保留在敦煌文獻中的一張名表，說明「五姓」此一罕見堪輿法的內涵。而〈敦煌寫本中的九宮圖〉、〈敦煌寫本中的烏鴉占〉、〈唐代風水——五姓理論及其子遺〉等一系列的研究也深具文書考釋和民俗上的價值。

在曆法方面，有：佛郎吉尼 (Franzini) 〈從敦煌曆日看中國曆書年月日的表達方式〉 (Formulation des dates en chinois à partir des calendriers de Dunhuang) (1996)、蘇遠鳴 〈敦煌年中十二日齋曆〉 (Un calendrier de douze jours par an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1981)。

其他，如：戴密微 〈敦煌研究的新動向〉 (Récents travaux sur Touen-houang) (1970)、隋麗玫 (Marie Rose Seguy) 〈中亞與中國發現的寶藏簡介〉 (Trésors de Chine et de Haute-Asie (introd.)) (1979)、戴仁 〈敦煌文獻研究的基本方法〉 (Eléments méthodologiques pour l'étude des documents de Dunhuang) (1984)、戴仁 〈歐洲地區的敦煌學研究〉 (Tun-huang studies in Europe) (1995) 等，則是有關敦煌學的綜論。

二、敦煌非漢文文獻研究

伯希和所獲的敦煌文書最爲學界稱道的，除了質精極具學術價值的漢文寫卷外，另外則是大量的非漢文文書，主要包括了：藏文、回鶻文、粟特文、龜茲文。因此非漢文的敦煌文獻研究也成爲法國敦煌學研究的重點與特色之一。法國在西藏學的研究，歷史悠久，成果非凡。在歐洲可說是居於領先的地位。伯希和從敦煌帶回數量龐大的藏文寫本，這些資料更促進了法國藏學的研究與發展，也造就了法國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在藏文文書的目錄編纂上，藏學專家拉露 (Marcelle Lalou, 1890-1969) 1931年進入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任教，同時對國立圖書館藏伯希和敦煌所獲藏文寫本進行修復、整理、考證和編目。從1939年至1961年間，先後完成了《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錄》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三卷。第一卷計著錄伯希和所獲的敦煌藏文卷子編號1-839 (1939出版)；第二卷著錄編號840-1282 (1950出版)；第三卷著錄了編號1283-2216 (1961出版)。

麥克唐納夫人 (Ariane Macdonald) 《國立圖書館所藏藏文文書選刊》 (三輯) (1978、1979、1990)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此書一、二輯係與今枝由郎合編。第一輯係從Pt 1-990中精選與佛教有關的藏文寫本58種攝製印行。第二輯爲世俗文書係從Pt 997-2220中精選《吐蕃王朝編年史》、《大事記》、寫經功德記、契約、帳簿、書信等非宗教文獻111件寫本照片；第三輯爲藏文詞彙彙集，係將一、二輯寫本中的詞句依字母進行排序，以便檢索。此書的出版提供研究敦煌藏文的學者極爲重要的資料。

巴考 (Jacques Bacot) 《敦煌發現的吐蕃歷史文書》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1940)，此書係與英國托瑪斯 (Frederik Thomas)、比利時圖散 (Gustave-Charles Toussaint) 合作完成的。內容收集了英、法所藏有關吐蕃歷史最重要的四件敦煌藏文寫本《吐蕃編年史》、《小邦邦伯與家臣名表》、《吐蕃大事記》、《贊普世系表》等，並轉寫、譯注。此稀世敦煌藏文文書，蓋出自藏族史臣之手，可以唐代史書相互印證，是有關吐蕃歷史的重要依據，此書的整理與研究，也爲研究古代吐蕃史開闢新的門徑。

巴爾比 (Jagbans Kishore Balbir) 《敦煌藏文本羅摩衍那故事》 (1963) (L'histoire de Râma en tibétain d'après des textes de Touen-houang) 將Pt. 981法藏敦煌藏文寫本《羅摩衍那》影印出版並將之轉寫爲拉丁文，並作法文翻譯與注釋。麥克唐納《吐蕃民間文學研究資料》二卷 (1967、1971)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tibétaine) 將敦煌藏文寫本中的吐蕃民間故事《說不完的故事》加以轉寫、翻譯並詳加注釋，提供研究吐蕃民間文學的珍貴資料。今枝由郎《敦煌藏文寫本「生死輪迴史」研究》 (1981) (Histoire du cycle de la naissance et de la mort. Etude d'un texte tibétain de Touen-houang) 網羅法藏及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九種藏文寫本將《生死輪迴史》這一吐蕃時期的詩體佛教「偽經」給予復原。卡爾梅 (Samten Gyaltsen Karmay) 《大圓滿法》 (1988) (The Great Perfection Rdzogs chen) 此書副題作「西藏佛教的一種教法與儀軌」內容主要系統的論述西藏佛教寧瑪派的大圓滿法，其中析論英國印度事務圖書館藏三件有關大圓滿法的敦煌藏文寫本，持與西藏地區的禪宗傳統進行比對，並論述其與各派密宗、本教之間的關係。

布隆多 (Anne-Marie Blondeau) 敦煌寫本中的吐蕃馬學



和馬醫學資料》(1972)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 l'hippologie et de l'hippiatrie tibétaines, à partir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此書係利用敦煌藏文寫本探討古代西藏獸醫技術的第一本專著。內容除轉寫了六篇敦煌藏文寫本並詳加注釋外，同時也論述了吐蕃時期有關馬的身體結構與醫術等問題。

伯希和《西藏古代史》(*Histoire ancienne du Tibet*) (1961) 係伯希和遺稿，由其弟子韓百詩 (Louis Hambis) 整理印行，除《新舊唐書》等史書中〈吐蕃傳〉的翻譯外，主要根據 Pt 1263 敦煌藏文寫本，進行轉寫及譯注。

石泰安 (Rolf A. Stein) 《西藏的文明》(*La civilisation tibétaine*) (1962) 充分利用敦煌藏文文獻及傳世藏文典籍，析論西藏的歷史與文化。內容對西藏的地域、居民、歷史概況、社會、宗教、習俗、文學、藝術等課題均有詳細的論述。資料豐富，極具參考價值。《漢藏邊境的若干古代部族》(*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étaines*) (1961) 利用敦煌藏文文書與傳世藏文資料並結合漢文典籍，對古代漢藏交界地區許多支古代部族的傳說、地理、歷史等問題，進行有系統的探討。

此外還有：吳其昱〈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四件吐蕃文寫本佛經〉(*Quatre manuscrits bouddhique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Centrale de T'ai-pei*) (1971) 今校由郎〈吐蕃文伯希和 1291 號寫本戰國策〉(*L'identification de l'original chinois du Pelliot Tibétain 129, traduction tibétaine du Zhanguo ce*) (1980)、石泰安〈吐蕃王漢藏二尊號「聖神贊普」〉(*"Saint et Divin", un titre tibétain et chinois des rois tibétains*) (1981) ……等。

有關回鶻文方面，主要為哈密頓 (James Russell Hamilton) 的論著，如《敦煌九至十世紀回鶻文字本匯編》(*Manuscripts Ouigours d'un siècle de Touen-houang*) (1986) 計收錄英、法所藏的敦煌寫本回鶻文獻 36 種，加以轉寫、翻譯並詳加注釋。內容包括了宗教文書的佛教典籍、摩尼教文獻及世俗文書的詩歌、諺語集、牒狀、信函、帳目等，是敦煌回鶻文書之大成。此外，作者撰文對這些敦煌回鶻文書產生的歷史背景、內容、作者、時代語言特點等問題作出精要的論述，並附上寫本影本，是研究敦煌回鶻文書的重要資料。《五代時期的回鶻》(*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 (1955) 內容論述了五代前期的回鶻史，將《新舊五代史》、《五代會要》等史書中有關吐蕃、回鶻、突厥、黨

項等傳加以譯注；敦煌寫本 P.2922 沙洲朔方節度使致甘州回鶻的三件書信細為翻譯、詳加注釋，析論五代回鶻史的概要，建立漢代回鶻與甘州回鶻可汗世系表，書末並附有十世紀突厥語的漢字音韻研究。《敦煌回鶻文寫本善惡二王子的佛教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 Manuscrits ouigours de Touen-houang*) 內容主要將法藏 P.3509 冊子本回鶻寫本及英國印度事務部藏 Or 8212-118 回鶻文寫本，進行轉寫、翻譯，詳加注釋，並附全部影本。作者同時撰文指出此故事源自《大方便佛報恩經·惡友品》，為西州回鶻使者於敦煌時所翻譯抄寫的，是研究十世紀敦煌、吐蕃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獻。

在粟特文方面，伯希和除了記述行旅見聞的考察報告外，在 1911 年返國在法蘭西學院開設中亞講座後，還進行了關於非漢文寫本和摩尼教的研究。在非漢文寫本中，伯希和對粟特文、藏文、東伊朗語都有所涉足，而其中又以對粟特文寫本的研究，成果最豐，所發表的相關論文包括了：〈粟特語和漢語對照寫本〉(*Un bilingue sogdien-chinois*) (1911)、〈沙州都督府圖經和羅布泊地區的粟特移民〉(*Le Cha-tcheou tou-tou-fou tou-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égion du Lob Nor*) (1916)。另外高梯奧《粟特語語法試論》(*Essai de grammaire sogdienne*) 二卷 (1914、1923) 主要根據敦煌佛教粟特語資料，研究粟特語言、詞法、句法及詞彙等問題，是敦煌粟特語佛教文獻研究的基礎。而高梯奧、伯希和合作的《漢語和粟特語善惡因果經研究》二冊 (*Le Su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u bien et du mal, texte sogdien et chinois*) (1920-1928)，列入《伯希和中亞探險叢刊》，整理伯希和所獲敦煌粟特語《佛說善惡因果經》寫本。內容包括寫本的轉寫、詞彙及粟特文與相應漢文本的法文翻譯和注釋，是第一部長編粟特語佛典圖版與釋文的刊印。邦旺尼斯特 (Emile Benveniste) 《粟特語吠桑檀羅本生故事研究》(*Vessantara Jataka*) (1946) 收入《伯希和中亞探險隊叢刊》。內容主要針對美、法所藏敦煌粟特語「吠桑檀羅本生故事」寫本，進行轉寫、翻譯及注釋、詞彙研究等。

在龜茲文方面：菲利奧禮 (Jean Filliozat) 《龜茲語醫藥占卜文獻殘卷》(*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 de magie*) (1948) 主要針對敦煌、庫車出土的龜茲語醫藥文獻九件占卜文獻進行轉寫與翻譯，並論述文獻的時代及「吐火羅語」定名問題與龜茲字母。



三、繪畫藝術研究

在藝術品、文物資料方面，哈干 (Joseph Hackin)〈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考察所獲資料展〉(1921)、里布·維亞爾 (Gabriel Riboud)〈吉美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紡織品〉(1970)、隋麗玫〈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木雕版圖像〉(Images xylographiques conservées dans les collections de Touen-ho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9)、費熱爾·洛爾 (Laure Feugere)〈伯希和藏品介紹〉(The Pelliot collection) (1989)、王微〈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畫卷〉(1994)等，提供了法藏敦煌藝術品與文物的具體介紹。在石窟藝術方面，有：伯希和〈尤莫弗波羅氏收藏的壁畫與敦煌壁畫之比較〉(Les fresques de Touen-houang et les fresques de M. Eumorfopoulos) (1928)、拉露 (Lalou)〈中亞的繪畫與印度神話〉(Mythologie indienne et peintures de la Haute Asie) (1946)、費薩達 (Fourcade)〈敦煌壁畫介紹〉(La peinture murale de Touen-houang) (1962)、奧布瓦耶 (Auboyer)〈絲綢之路——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的古代中亞藝術品〉(La route de la soie. 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ancienne dans les collections publiques françaises) (1976)、戴密微、饒宗頤、李克曼 (Pirre Ryckmans)《敦煌白描畫》(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 (1978) 此書編入《法國遠東學院考古叢刊》，內容主要收集英、法所藏敦煌文書中的各種白描畫本、粉本、刺孔雕空、紙範剪紙等繪畫資料，影印出版，並探討白畫的源流與敦煌畫風，敦煌白畫的技法、內容、畫工、畫風與其他地區的關係等問題。德納斯 (Françoise Denes)〈吉美博物館藏敦煌木雕介紹〉(Catalogue raisonné des objets en bois provenant de Dunhuang et conservés au Musée Guimet) (1976)、蘇遠鳴〈伯希和 3304 號背繪畫題記選〉(Un recueil d'inscriptions sur peintures : le manuscrit P.3304 verso) (1981)、伯希和〈伯希和敦煌洞窟筆記壁畫及其題記〉(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s de notes,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 (1981-1992)。

而蘇遠鳴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可分為圖像和題識兩個方面。圖像部分有：〈敦煌石窟壁畫上的瑞像〉(Quelques représentations de statues miraculeuses dans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1984)、〈繪畫與素描有關圖像小考〉(Peintures et dessins : notes iconographiques) (1999)、〈敦煌畫上的供養人〉(Les donateurs dans les peintures de Dunhuang) (2000) 三篇。題識部分有：〈伯希和 3304 號背繪畫題記選〉(Un recueil d'inscriptions sur peintures : le manuscrit P.3304

verso) (1981)、〈敦煌寫本中的壁畫題記〉(Quelques inscriptions de peintures murales recueillie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1984) 兩篇。蘇遠鳴認為由部分題識集次序的混亂以及書寫字跡的潦草，可以說明題識集應是一種工作用的抄本，它是由一名畫家或畫師對為石窟壁畫施工所作的設計稿。

此外還有：科隆貝爾·皮埃爾 (Pierre Colomel)〈敦煌壁畫的繪製技術暨遺址保護〉(Technique de la peinture murale à Dunhuang et protection du site et des oeuvres) (1984)、吉埃思·科恩 (Cohen Gies)〈西域佛教——絲綢之路千年的藝術〉(Serinde, terre de Bouddha: dix siècles d'ar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1995)、吉埃思、蘇遠鳴、戴仁、艾麗白、梅弘理、石內德合著的《中亞藝術——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編號繪畫》(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 la collection Pelliot au Musée Guimet) (1995-1996)。

關於佛教藝術、圖像方面，Raphaël Petrucci〈敦煌佛教繪畫(斯坦因)——1914 年在吉美博物館的系列演講稿〉(Les peintures bouddhiques de Touen-houang (Mission Stein), Conférences faites au Musée Guimet en 1914) (1916)、尼古拉·旺吉埃 (Nicole Nicolas-Vandier)〈舍利弗與六師外道圖卷考〉(Sariputra et les six Maîtres d'erreur (trad. et comm.)) (1954) 主要將 P.4524 繪圖本《降魔變》全部圖本彩色精印，並作法文翻譯，詳加注釋，提供變文與變相關係研究之寶貴材料，此外尚有〈關於敦煌業報圖的幾個問題〉(Aspects d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u-delà dans l'iconographie de Dunhuang) (1976)。蘇遠鳴有〈中國佛教圖小考——地藏菩薩的隨侍二童子〉(Notes d'iconographie chinoise : les acolytes de Ti-tsang) (1966-1967)、〈佛教圖像小考：敦煌的明王和金剛〉(Notes d'iconographie bouddhique : des Vidyaraja et Vajradhara de Touen-houang) (1987)；熱拉·貝札爾與瑪雅爾 (Jera-Bezard, Robert et Maillard, Monique) 也有系列的研究，如〈中亞發現的昆沙門天圖像與印度貴霜文化的聯繫〉(La représentation de Vaisravana dans l'Asie Centrale, un rapport possible avec le monde Kusana) (1976)、〈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收藏的斯坦因收集品——阿彌陀佛淨土圖〉(Un Paradis d'Amitabha de la collection Aurel Stein conservé au Musée National de New Delhi) (1976)、〈Sri Devi 中亞吉祥天圖像特徵〉(A special iconography of Sri Devi in Central Asia) (1989) 等，成果可觀。此外，有侯錦郎〈敦煌印沙佛與千佛圖片研究〉(La cérémonie de Yin-cha-fo et les

estampes des Mille Buddhas) (1984)。

在彩幡方面，有：尼古拉－旺吉埃〈吉美博物館收藏的敦煌彩幡和繪畫〉(Bannières et peinture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 Guimet) (1974-1976)，而全面系統研究的則是熱拉－貝札爾，主要論文有〈伯希和收集品中六件尚未公布的幡頭〉(Six triangles de tête inédits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1978)、〈吉美博物館藏一件尚未公布的敦煌幡〉(Une bannière de Dunhuang inédite au Musée Guimet) (1983)、〈敦煌彩幡的來源與裝裱技術〉(Origine et montage des bannières peintes de Dunhuang) (1985)、〈彩幡和卷軸畫在中亞佛教儀軌中的作用〉(Le rôle des bannières et des peintures mobiles dans les rituels du bouddhisme d'Asie Centrale) (1989) 等。這些彩幡在莫高窟中原本是成套配置的，但是為了運輸的方便而被從原件上拆卸下來，如今產生了恢復原狀的困難。敦煌的彩幡主要由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攜走，有一段時間分散深藏在大英博物館、新德里國家博物館和巴黎

吉美博物館中，不為世人所知。近年由於相關出版品的問世，彩幡開始引起學者的注意。法國研究彩幡最重要的學者非熱拉－貝札爾莫屬，她由 1978 年起，便持續關注此一議題，並試圖運用印度、中亞、中國中原繪畫和雕刻上的材料作為佐證，恢復彩幡原來的裝置。

法國敦煌學研究的起源早，歷史悠久，研究範圍廣；成員跨越學科，研究蹊徑多獨闢；注重團隊合作，華裔學者多，整合力強，凡此均為其主要特色。

至於法國敦煌學研究的主要人力，則大致來自：法蘭西學院、法國遠東學院、法國巴黎大學、法國漢學研究所、法國國立科研中心、法國國立圖書館及法國敦煌寫本研究組……等機構。研究成果，主要則發表在：《通報》、《亞細亞學報》、《法蘭西遠東學報》、《亞洲藝術》……等刊物，以及法國國立科研中心及法國遠東學院的《敦煌學論文集》(Contribution aux Etudes de Touen-Houang) 等。以上所述僅其概略，聊供參考而已。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目錄類第 4-2 種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1908- 1997)



本目錄係漢學研究中心委託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鄭阿財教授、嘉義師範學院朱鳳玉教授主編。全書蒐集西元 1908-1997 年間，海峽兩岸及東亞地區學者之敦煌學研究成果，並且旁及海外漢學家的研究目錄。共收錄敦煌學研究的專著、期刊論文、論文集篇目、學位論文及報紙論文等約一萬二千筆。民國 89 年 4 月出版。臺灣地區定價新臺幣 700 元，其他地區定價美金 35 元。(含郵資)